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书社

译注 马秀娟

审阅 刘烈茂 宗福邦

王安石诗选译

44.3542
WAS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王安石诗文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侯跃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王安石诗文选译

马秀娟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12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并不多。千百年来，人们谈及改革，总是忘不了王安石。尤其是他所推行的变法，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在当时的社会上掀起滔天巨浪，向来争议甚多，这就更为加深人们的印象。现在要重新认识王安石，探讨其诗文的成就与特色，自然免不了多花点篇幅谈谈这次变法的重大实践和在变法中扮演主角的王安石的具体表现。

王安石，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晚年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号半山老人，曾被封为荆国公，故人称王荆公，死后谥曰：“文”，故又称王文公。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

家。他曾官居宰相，主持过“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改革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却遭到了许多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并逐渐引起了党争，他也被推进北宋后期政治漩涡的中心，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对于他的变法的得失及个人的历史作用，在他生前及死后都一直毁誉纷纭，意见极不一致，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王安石又是熙宁元丰时期学术界的一派领袖，他主持撰写过《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书经》这些儒家经典重新作出评价。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派，号称“荆公新学”，“新学”与他主持的变法一样，也遭到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和学者们的攻击与讥评，但他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即使是他的论敌也不能无视其存在。

对于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古往今来无多大争议，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予以肯定和赞扬。王安石是当时的古文名家，他的散文言之有物，风格精悍劲峭，政论文尤具特色，他的杰出的散文成就，使他与韩、柳、欧、曾、三苏并列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诗歌成就在中国诗史上也占有突出地位，他是开一代诗风的宗师之一，他的诗形式多样，且各体俱工，尤以绝句的成就最高。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的新淦县（今江西新干）。他的父亲王益，字损之，当时在临江军任判官并兼领新淦县。王安石十七岁时，王益任江宁府通判，二年后，卒于任上，从此，王安石便在江宁居住下来。

仁宗庆历二年（1042）三月，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由于文章作得好，本来已被列为第一，考卷送给皇帝过目，仁宗发现王安石的诗赋中有一句话触犯了忌讳，便将他降作第四名。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在扬州三年任满之后，庆历六年（1046）被任知鄞县（今属浙江）。王安石在鄞县是一位克尽职守的县令，他督促乡民兴修水利，构筑堤堰，疏浚渠川，开挖陂塘，并亲自到渠川决口处去实地考察，常常天不亮起床，深夜才得休息（见《王文公文集·鄞县经游记》）。为使农民有能力正常耕作，他在春耕时节将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秋收后，只加少许利息归还，使贫困的农户得以少受兼并之家的重利剥削，这种举措收到了实效，使他更加自信，无疑对他执政后决定在全国实施青苗法大有影响。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以殿中丞资格升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上任第一年，宰相文彦博即向仁宗举荐他，赞扬他“恬然自守，未易多得”。朝廷下诏让王安石赴阙就职，他坚辞不赴。舒州通判任满之后，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被改任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养马事务的机关，此时群牧司的长官是包拯，与王安石同任群牧判官的是司马光。这时，欧阳修正服母丧期满回到京师，王安石开始与他们交往，欧阳修非常赏识王安石的人品与才学，曾赠诗给他，还曾两次上书仁宗，举荐他为国家的栋梁之臣。

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知常州（今属江苏），不久，又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在此任上，他仍以兴利除弊为己任。加上他在地方任职十余年的实绩，声誉日隆，许多人希望与他相识，朝廷也将他从提点江东刑狱任上召回京师，并于嘉祐五年（1060）五月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同年秋兼任同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六月，改任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由他的过继儿子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同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在京师去世，他护送母亲的灵柩回江宁，安葬于钟山，便在江宁定居守丧。期满后，朝廷几次

招他赴京另加任用，但他见英宗多病，不能有所作为，朝政死气沉沉，估计自己入朝干不了什么大事，便以病相辞，终英宗之世，再没有出仕。

二

宋太祖赵匡胤是利用“陈桥兵变”这种阴谋手段，在一夜之间变成宋朝开国皇帝的，因此他时刻戒备部将叛变，将消弭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武人擅权的祸害作为制定国策的出发点。他登基不久，即采纳谋臣赵普的建议，削夺将领的权利，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方镇的财源，解除他们的兵权，将全国的精兵锐卒集中于京师，编为禁军，由皇帝自己统率。又将地方财权、司法权收归中央，使过去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状况有了根本改变。

为了使这些措施得以顺利地实行和延续，宋王朝用高官、厚禄、特权来笼络将领，鼓励他们兼并土地，并大大扩充官员数额，以争取地主官僚的支持。由于官吏人数剧增，许多官僚虽有官位，但无职务；只坐享俸禄而不干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遇事推诿，上下敷衍，吏治日趋腐败。

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与武臣的叛乱，北宋王朝不断增加兵员数量，太祖时，禁军、厢兵合共三十

七万八千，仁宗庆历年间则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军费开支高达国家财政总机关三司所掌握的总收入的十之七八。但这百万大军却缺乏严格的训练，养成了骄堕习气。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与频频侵扰的契丹、西夏的战事就常以宋军败北而告终。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王朝与契丹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须向契丹献白银十万两，绢帛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起，每年又增加银十万两，帛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以“岁赐”名义，每年向西夏献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

北宋的“冗官”、“冗兵”耗费大量财物，对辽和西夏的“岁贡”也是沉重的负担。皇室又恣意挥霍，费用无度，国家日益困穷，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仁宗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官员曾建议更新朝政，“兴致太平”。庆历年间还兴起了范仲淹主持的“新政”。但因遭到守旧官僚贵族集团的猛烈攻击，尚未真正实施，便已失败。此后，韩琦、富弼等人的锐气渐减，北宋王朝的病根也越种越深。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其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时年二十岁，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立志变法，并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

身上，故继位后即委任王安石知江宁府，九月，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便立即计划实行变法，当时他四十九岁，正是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之时。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自熙宁二年七月至七年九月，陆续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变法的主要措施，并改革学校科举。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之家，打击了大官僚、大商人对人民的掠夺；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王安石变法最终仍以失败告终。新法失败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由于新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因而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反对派的强大；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变法进程过急等。

王安石更革“祖宗旧制”的举动，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守旧派的反对下，王安石两次被罢相。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去后，哲宗赵煦即位，时年才十岁，由英宗高后临朝听政，司马光执政，新法被陆续废除。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之

后，直到元祐元年（1086）四月逝世，都居住在江宁。这十年他是在闲适而又忧患的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他先在江宁东门外离城七里多路的地方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居所，这里正好处在由江宁至钟山的半途中，故取名“半山园”，他也就自号“半山老人”。他的住宅很不讲究，“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续建康志》）钟山周围的名胜颇多，王安石经常携带书卷往来于钟山各胜迹之间，定林寺、法云寺、八功德水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经常在山石竹树边闲坐，在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中怡情悦性，并写下了大量歌颂自然风光的诗章。

王安石在钟山，与不少诗人往还，亲朋故旧经过江宁也必定去看望他。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大画家李公麟也是王安石座间常客。米芾还将王安石在定林寺经常休息、读书著述的房间，取名为昭文斋，并书写斋名。李公麟也替王安石画了一幅像挂在昭文斋中（见曾慥《高斋漫录》）。

王安石退隐期间，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自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江宁时，曾去拜望王安石，并在江宁盘桓过一段时间。他们两人的政治

见解、治国方略均不同，苏轼又曾反对过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与实践，所以在政界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但他们在文学上却是互相倾慕的。这次会面，王安石大为高兴，他们同游钟山，论诗谈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虽然政见上的分歧无法消除，但两人在文学上的共识，使他们相处比较融洽。

王安石退休后的生活并不都是闲适的，他其实并未忘怀国事，而是经常处在矛盾的心境之中，对于变法的进程得失，他仍然十分关心，只是强迫自己用闲适淡泊将对国事的关心掩盖起来罢了。元丰八年神宗的去世，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变法是在神宗的主持下实现的，神宗逝世使他对政局不无忧惧。元祐元年，司马光为宰相，逐一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原已在病中的王安石，痛苦地承受着打击，衰病的身体也更加虚弱，终于在该年的四月初六日忧愤而逝。

三

王安石不仅是变法派的领袖，而且也是当时众多学术派别中的一派领袖人物。他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荆公新学”，而新学的标志又是《三经新义》的修定颁行。《三经新义》的纂修工作，正式

开始于熙宁六年（1073），朝廷设置经义局，命王安石主管经义局的工作，吕惠卿兼修撰，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兼同修撰，训释《诗经》、《书经》、《周礼》。熙宁八年六月，《三经新义》完成，不久就由国子监刻版颁行全国，成为官书。其中《周礼义》是王安石亲自撰写的；《诗义》是王安石父子共同撰作；《书义》由王雱撰写。

王安石主持撰写《三经新义》有着鲜明的为变法服务的目的。他认为儒家经典都是圣王的精义，但降及衰世，伪说蛊惑人心，私学扰乱政治，烦琐的章句传注淹没了经典的原义，使精妙深奥的真理隐而不见，而错误的言论行动却非常猖獗。因此，需要对已被弄乱了的儒家经典，作出合理正确的解释，以教育风化百姓，形成良好的风俗，抵制打击错误言行，其现实意义是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

《三经新义》中，王安石最重视《周礼》，王安石的重要变法措施，都是打着《周礼》的旗号进行的。以变法的实际需要来解释《周礼》，又据《周礼》来为变法的具体措施辩护，这样，就为新法找到了一件最堂皇的外衣，使变法的种种举措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为了驳斥反对派对新法的指责，王安石也努力从《周礼》中寻找武器。比如，反对